

潘國增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叢書

K827.52
6

06800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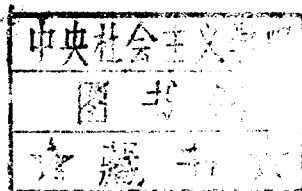


200426397

曾國藩

卞哲 著

DJ46/52-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曾国藩

卞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2,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600

书号 11074·603 定价 0.49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曾国藩像

目 录

一、末代道学家·····	1
二、办团练，建湘军·····	15
三、向太平天国发动进攻·····	35
四、初任两江总督·····	56
五、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人民·····	82
六、攻陷天京·····	106
七、“剿捻”失败·····	126
八、回任两江总督·····	141
九、最后三年·····	149
结束语·····	160

一、末代道学家

青少年时代

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五年)，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有名的刽子手，被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湖南衡阳，世代务农，清初始迁至湘乡，传到他的五世祖时，已成为颇有产业的地主，但并“不显于世”。曾国藩后来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①乃是事实。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本是浪荡子弟，“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几几乎搞掉了家产。在长辈的讥笑声中，他才结束了浪荡生活，天天督促长工，凿石决壤，变小田为大田，养猪养鱼，开辟财源，成了一户土老财。在封建时代，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虽然有钱，社会地位仍不会太高。曾玉屏“早岁失学，壮而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世界书局版(以下未另注版本者同此)。

引为深耻”^①。耻什么？就是缺少名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后代，决心让后代发奋读书，遵循封建时代由科举而做官的正途。

曾国藩的父亲名麟书，字竹亭，自幼读书。曾玉屏虽严加督责，但在子曰诗云方面，却不能给儿子以任何帮助。曾麟书十几岁开始应童子试，一连考了十七场，到四十三岁两鬓已经斑白，才补了县学生员，成为一名老秀才。

靠曾麟书科举登仕、光耀门庭是不行了，曾玉屏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曾麟书生五子四女，曾国藩是他的大儿子。依次是：国潢，字澄侯；国华，字温甫；国荃，字沅浦；国葆，字事恒。五人性情、气质很不相同，曾玉屏最中意的是长孙曾国藩。

曾国藩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曾麟书毕竟读了一些书，略识科举考试的蹊径。这对曾国藩的教养，比起曾玉屏对于自己，无疑是有助益的。在曾麟书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时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第二年，他的弟弟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作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照朱熹的解释，写了出来。他的祖父乐哈哈地称赞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②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曾国藩十六岁，去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七。一八三四年，二十四岁，肄业于长沙岳麓书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大界墓表》。

②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嘉庆二十五年。

院。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理学家朱熹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这年，他参加乡试，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年底，入都参加会试。

曾国藩在北京，住长沙郡馆。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会试不售，第二年会试，再报罢^①。两次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途经金陵（今南京）时，他把借得的路费大部分用来购书，“归而诵习益勤”^②。如此苦读了两年，他的八股、制艺便大有长进。一八三八年，再入都会试，中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殿试，列三甲第四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最后朝考^③，列一等第三名，拔置第二名。因为成绩优良，便选入翰林院的庶常馆深造，当了庶吉士。他从此更名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

清朝制度，庶吉士还得学习三年，经过考试，成绩好的，授以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列各部任主事或外放知县。不管怎样，官是做稳了。二十余年寒窗苦读，总算有了出头之日。这年秋天，曾国藩便踌躇满志地起程回家。曾家世代代，只有曾国藩第一个点了翰林，他的祖父因此大宴宾客，十分热闹。

在封建社会里，为了表示自己家族的源远流长和名门显宦的历史，凡有社会地位的人家，多修有家谱。曾家世代

① 清制，乡试中式为举人，始得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三年一次。道光十六年的一次，应为加科，非常例。

② 《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军事”：《曾国藩传》。

③ 清代进士经过殿试取得出身，仍须再进行一次殿试，特派大臣阅卷，是为朝考。朝考等于殿试的复试。然后才视成绩授予官职。

“微薄”，没有家谱。现在不同了，曾国藩入翰林发了迹，当然得修谱牒。于是，曾国藩风尘仆仆地在以衡阳为中心的几个县里奔波，南到耒阳、永兴、清泉，西北至邵阳、武冈、新化、安化，“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忙了大半年时间。

这年冬天，曾国藩赴京，在庶常馆继续进修。

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道学家

一八四〇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登入仕途。这是他生活、思想的一个转折。以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制艺，以图科举；此后直到组织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武装，首尾十年，完全究心于诗古文辞、宋明理学，把自己修养成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道学家。

道学，又称理学^①，是封建时代的儒家哲学思想，以继承孔孟道统、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性命之学为主，故有此称。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历明、清盛行不衰，统治者希图以儒学道统来卫护封建君统。所谓“道统”，指儒家传道的统绪，唐朝韩愈首先正式提出此说。他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是一脉相承的传授儒术的正统，自己则隐然以遥承孟子自居。宋代朱熹则摒弃韩愈，以周敦颐、程颐和程颢上承孟子，自己又接周、程。明、清之际的孙夏峰，又在朱熹后面加上陆象山、王阳

^① 有的研究者认为，把理学称做道学是不科学的，有一定道理。这个问题不是本书的主题，故不详论，而沿用习惯说法。

明，这就是所谓的儒学道统。儒学道统是封建君统在学术上的投影，也是君主专制的护符。为此，清朝统治者对道学大力提倡和支持。康熙皇帝命人撰写《性理大全》，编纂《朱子全书》。他的子孙们又把理学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著作，定为士子必读书和科举考试命题、判卷的依据。

曾国藩是在科举道路上一步步爬上官位的，所以他在做官以前，早已接触到道学；不过那时主要用心于制艺八股，把这当做敲门砖，用以敲叩科举之门；对于理学的全部奥蕴，还来不及穷究消化。叩开科举大门以后，他才潜心探究此中奥秘。十来年中，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王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

还在一八三五年，第一次会试不售，留寓京师读书之时，曾国藩便已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①。以后，他又仔细研究韩愈思想、学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思想颇受韩愈影响。对于韩愈宣扬封建道统的《原道》篇，更是十分推崇，认为是孔、孟以来“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寥寥可数的好文章之一。^②韩愈在《原性》篇中，继承董仲舒性三品说，把人性分做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和下品是不可改变的，但“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可按封建的道德来改造中品的人性。曾国藩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合……韩公之言固无失耳”^③。韩愈是一个维护封

①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 “自孔孟以后，惟廉溪《道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曾文正公全集·书牍·与刘霞仙》）

③ 《曾文正公全集·读书录·韩昌黎集》。

建君统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与柳宗元一起，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崇尚质朴，反对柔靡文风，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散文。曾国藩受到韩愈维护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其优秀文风的熏陶，“慨然思蹶而从之”^①。他日后在日记、书信中，常常谈到韩愈的文章，称赞它“意义层出，笔仗雄拔”^②，流露出无限倾慕之情。

从韩愈到朱熹，本是一脉相通的。曾国藩推崇韩愈道学，自然就会走向程、朱理学。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记载，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一八四二年，“公益致力程、朱之学”。以后，他不但致力研究，而且力图以理学作为自己修身行事的准则。一八四四年，曾国藩“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③就完全是理学家修身养性的一套。

曾国藩踏上仕途就崇奉理学，除了地位变化这一原因之外，当时一批究心理学的师友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

唐鉴最早诱导曾国藩致力理学。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史称他“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④。一八四一年八月，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向他请教，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从此，曾国藩便“以朱

①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 《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③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四年。

④ 《清史稿·唐鉴传》。

子之书为日课”^①。这个时期，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或月一至，或再三至”^②，以师礼事之。唐也很赏识曾，后来撰辑《学案小识》，便请曾国藩校刻。

大学士倭仁，是曾国藩钦敬的另一前辈理学家。倭仁，蒙古正红旗人，字艮峰。据说他“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为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③。曾国藩向他请教，他告诉曾国藩“好问”、“好察”最要紧。^④曾国藩日后时以“痛自刻责”自勉，可能与倭仁的影响有关。

与曾国藩一道研讨理学的，还有同乡好友刘蓉^⑤、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仁和邵懿辰等等，都是当时被称为“绩学之士”的人物。

理学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产物。自北宋产生，发展到南宋，就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一派是以陆象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明代王阳明又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两派都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为核心。到了清代，随着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理学也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这不仅表现在清代进步思想家戴

①③ 《曾文正公全集·嘉言钞》。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曾国藩在此文中说，唐鉴入京为太常卿在一八四〇年。查这年五月，曾国藩散馆授职检讨，七月卧病，十月方愈，似不可能常趋唐鉴处请教。一八四〇年当为误记。此处从《年谱》，以一八四一年为是。

④ 《曾文正公全集·嘉言钞》。

⑤ 曾国藩二十四岁时与刘蓉订交，他们的友谊始终笃厚，曾国藩曾认为他们二人之友谊为“天下之至爱”。他谈理学的最主要的三篇文章之一，就是《答刘孟容书》。

震等人对理学的尖锐批判，更表现在理学已陷于僵化的泥坑，而无新的发展。曾国藩主要崇奉朱熹一派，他和理学师友只是勉强守护住藩篱，所发议论，也多是重复或阐述朱熹等人的余唾。例如，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①

这是朱熹“理一分殊”之说的复述。^②既然“理一分殊”，如何认识这唯一的绝对的“理”呢？又如何从不同的“分”体现这同一的“理”呢？

这就要“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他说：

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③

这是“理一分殊”之说的发挥。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认识那总的唯一绝对的“理”。反过来证明，“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就认识的规律来说，只有先认识具体的事物，才可能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特征，认识事物的本质。曾国藩讲的认识“理”的途径，应该说是合乎思维逻辑的。可是，理学家们的理，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认识理，只是要体认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这样，唯心主义的思想就淹没了它的认识论的合理的因素。

再如，他解释“性”、“命”与“理”的关系，认为，“理”体现

①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答刘孟客书》。

② 程颐称道张载《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解释说：“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安得而不殊哉？”意在将封建伦理永恒化、神圣化。

初五日 早起高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
 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曰死之日可
 以仰希萬一昏濁如此恐旋即背棄也戒之讀易遇
 卦遯卦無心得會客三次未正走馮樹堂處看樹堂
 日課因與語收攝之方無諸己而責諸人可恥且談
 時心有驕氣摠由心不虛故歸寓靜坐一時成寐何
 不振也飯後低雲來談詩字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
 便無餘味所謂德之素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
 乎臨帖二百字記本日事作字時心頗活潑
 初六日 早讀易大壯卦象大象正與養氣章通爻辭無所得

曾國藩手書日記

于万事万物当中，在人为“性”，在天为“命”，这“性”、“命”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

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

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①

这些都是对程、朱理学家所谓“性即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等说法的阐述。

其余，在人性问题上，他有时直接引用孟子“人性本善”的命题，同时，也采取程朱“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作补充。他认为，纯善的天理之性或义理之性充塞天地，圣人、常人的秉性都是一样的善。只是圣人不但得其全，而且他的气质又最清、最厚，又没受到什么习染，所以他最能体现、实践封建的仁义道德，尽人的天性；常人却恰恰相反。而气质的清、浊、厚、薄决定了人是圣人还是常人。气质又是先天禀赋的。归根到底，圣贤智愚，都是先天决定的。不过，只要“格物诚意”，即通过学习修养，便仍然能恢复人的善性，体现人的天性，为圣为贤^②。

当然，曾国藩的理学也不完全是前儒学说的复写。他的理学也带有时代的印记。

清代一些理学家，把王阳明主张“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即心学，与明朝的覆亡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亟主抛弃空疏的心学。其中，桐城派^③理学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顺性命之理论》。

②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答刘孟容书》。

③ 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康熙时由方苞所开创，其后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这一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及唐宋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三弟書云：謂予對人談，是應詩有應，非其年也。
實壽無禮之應，則勉強從人，蓋一半仍從毀譽心起。
怕人說我不好也。良峰前輩教我，掃除應酬，殆謂
此矣。張雨農邀同生廡肆買書，又說話太多。黃第卿
兄弟到京，便去看與岱雲同至小珊處，渠留晚飯，有
援止而止底意思。又說話太多，且背議人短細，思日
日過惡，總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從毀譽心起。
欲另換一箇人，怕人說我假道學，此好名之根株也。
嘗與樹堂說及樹堂已克去此心矣，我何不自克耶。
記廿四、五、六、七、四日事。

二十日早起，讀小過卦，飯後岱雲來示以詩，閱良峯先生日

曾國藩手書日記

家更把這種思想，與他們倡導的古文運動結合起來，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的主張。曾國藩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觀點，但又有所保留。一八四三年，他在給諸弟的信